在作者田余庆于八十年代提出本书的观点时，史学界对门阀政治问题尚没有定论，待到今日，作者“严格的门阀政治只存于东晋时期”的判断，俨然成为学术界的一般观点而得到接受。除了关于时代背景和历史大阶段的整体概括外，作者在本书中基本上将东晋江左百年的关键历史事件详细梳理分析了一道，读罢此书，也算是对东晋的历史发展，有了一个较为深入的认识。史学事实的判断及具体事件的展开，我们在此暂无置喙之处，仅有的一点关于东晋门阀政治与贵族政治的比较，另撰有文章别论。

“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此说最显著的历史根据，为承轨北朝统绪的隋朝最终实现了南北合一，九州光复，开了所谓“中华第二帝国”之周期。然亦不能如此简单，便忽略了南朝于中华文化传统承继中自有功绩所在。东晋以来近三百载之南朝历史，就粗略观之，最大之贡献或有三：一为保存文物典章制度，虽不全为后人所继，亦有可为学习修改之基础；一为在北朝民族融合未能全面展开之时，有一缓冲，不至祸同元清；一为在北朝征伐战乱无休之时，提供一相对稳定平和之环境。则南朝之贡献主要在消极的，即未能在文化及历史的进步上有独创的成就，只是对已有之成果有所保存，此也暗合作者的意思，不过更为细化而已。

但南朝时期的所发生的另一影响，或许也有着在中国文化发展上的重要意义，但这既未被作者所关注，我们也还没有更多的史料佐证这一看法，这里也只能简单的提出，以供猜想。隋唐虽为中国“古典”时期的最兴盛之时，但在文化创造上，文艺的成就实要远远突出于思想的成就，甚至比较来说，汉唐宋三代，唐的思想创造又是最为不显的。这一过程，实际上已在东晋南朝之时便有其初步的征兆，为佛老之学在社会风气胜过了儒学传统，这其中又有更为具体的经过，则不能在这里详论。而且这一思想史上绝大的转戾，目前似无有专门之著作做深入的讨论，是为将来记也